

传播学译丛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Critical Junctures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传播革命

[美] 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 著

高金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Communication—Critical Junctions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传播革命

[美] 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 著

高金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7206/54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美)麦克切斯尼(McChesney, R. W.)著;

高金萍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4

(传播学译丛)

书名原文: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ISBN 978-7-5327-4724-5

I. 传… II. ①麦…②高… III. 传播学-研究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8204 号

图字: 09-2008-744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135113

责任编辑 马 胜

装帧设计 吴建兴

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

[美] 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 著

高金萍 译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61 000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724-5/G·147

定 价 35.00 元

推荐序

“紧要关头”：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喻国明教授

社会之进化如同生物进化一样：每一种进化与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这便意味着，一旦做出了某种“路径选择”，便永无回头路可走。因此，在每一个发展的关键点上的选择都是“紧要关头”。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历史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恰正处在这样一种必须做出某种选择的“紧要关头”。如果说，在非“紧要关头”时，我们尚可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做”这类战术性问题上的话，在“紧要关头”时，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关注重点放在“在哪做”、“做什么”这类战略性的问题上，因为它是“系好衬衣的第一个纽扣”。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这样一句话：“对于发展和进步而言，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比照我们这个时代危机爆发的频度和强度，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危机空前频繁、剧烈的时代，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不可靠性和不安全感。危机随时随地挑选它的牺牲品，而人们则无处可逃，因为已经失去了泊于过去的锚，也找不到驶向未来的帆。所以从容的战略不见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理论和实践都不过是应急管理和救火行动。而危机所造成的灾难“选择不同的日子，敲开每一扇门”，“灾难不是仇人所为，受害者无法叫出它们的名字，它们隐身于诸如全球化、市场竞争、金融体系和食品安全等光怪陆离的名目之下”^[1]；经济、政治、文化和个人生活仿佛都安插了导火索，在漂浮中寻找点爆的星火，“脚下的大地并不可靠，没有一块坚硬的基石，可以让人驻足一跃”。^[2]因此，行动已不再代表任何进步，而行动之后的幻灭感则

反映着既往历史的终结投射于文化上的情绪。

当下，知识分子和媒体开始日复一日地重复讲述着情节梗概大体相同的故事：在黑夜里，有一个醉汉丢了钱，他在路灯下一圈一圈地寻找，直到匍匐在地。勤奋的记者们完整再现了醉汉是如何转了一圈又一圈，并且访问了他的家属，甚至追溯了他的童年。专家们则争吵不休：有人说他应该再多转一圈；有人说他应该转得更快一点；有人说他为什么醉酒带钱走夜路呢——要么策略有问题，要么背后有阴谋；还有人说这“本质上”是一个法治问题，加强酒后理财机制建设势在必行。

这个寓言几乎成了所有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标准路线图”：从企业经营管埋到政府执政能力，再到个人的生活方式，人人皆是醉汉。其实，事实的真相是，钱并不在路灯下，只是因为醉汉觉得灯下最明亮、最便利。这也正是我们目前应对发展中的危机与困境时的真实状态，短视、自欺、直觉主义、绕舌绕圈子。远见卓识缺位，整体性的理解力丧失，一切流于虚浮和泡沫，最终被一盏路灯或者一条新闻遮蔽了。我想说的是，在当前的“紧要关头”，我们需要竭力呼唤知识分子超越意识和批判力，重归时代引领者的关键位置——这既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也是我们的尊严所依。而我们在麦克切斯尼 2007 年末出版的新著《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中所看到的，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高度上的砥砺之作，令我们有耳目一新之感。

西方学者关于传播的研究，大多落脚于传播活动是如何与其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控制力之间保持依存关系的，有人将其概括为“媒体—社会”二元论。在社会这张“网”中，媒体承担着三重角色：政策促成者、商品化对象、公众舆论渠道。就其根本来说，后两种角色的体现，是以前一种角色的实现为基础的。在阶级社会中，媒体的生存之道往往是与政府达成共谋，充当政府政策的促成者，从而成为维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公司媒体为主导的媒体系统，正是按照上述逻辑存在的。作为美国政治传播领域的知名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说：“美国媒介史就是一部大型公司利益持续不断、无往不胜的成功史。”在这个以公司媒体为主导的媒体系统中，

[1] [英] 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4 页。

[2] 同上，162 页。

公司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博弈是其核心，媒体高调追逐的公众利益已被视如草芥，弃如敝屣。继 1999 年的《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之后，麦克切斯尼在他的新著《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中，用实际行动展开了对美国媒体系统的“革命”。诺姆·乔姆斯基曾经指出，“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著作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值得那些关注自由与基本人权的人们仔细阅读。”

在《传播革命》中，麦克切斯尼既是一位媒体研究学者，又是一位传播活动家，他从美国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了 20 世纪出现的三个媒体与传播的“紧要关头”，认为 2000 年以来，美国已萌发出新的“紧要关头”的征兆。麦克切斯尼以具体的事例说明，长期以来，占据美国传媒业主流的公司媒体对民主的败坏，激发了人们对其本质的清醒认识，“媒体改革运动”已经箭在弦上。这场运动将是由学者推动、由公民主导的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公民参与政府的媒体政策制定，促成切实可行的、非赢利的、非商业化的媒介组织的建立，最终结束由最大规模的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使得媒介市场更加富有竞争性，将媒体控制权从大公司那里转移到公民手中。

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麦克切斯尼已经大致描述了他对“媒体改革运动”的行动方案：一，建立切实可行的、非赢利的、非商业化的媒介组织；二，建立与发展非商业化的、非赢利的公共广播与电视系统；三，商业广播涉及公共利益时，由政府加以规范；四，建立富有竞争性的市场，改变公司垄断市场的格局。^[1]在《传播革命》中，麦克切斯尼叙述了 2002 年他与乔希·西尔弗(Josh Silver)、约翰·尼古拉斯(John Nichols)共同创建了媒体改革组织“自由的新闻”(Free Press)，主办了三届全国性的媒体改革会议，现在这个组织已经拥有 35 万名成员，覆盖全国 50 个州。作为一名媒体研究学者，麦克切斯尼已经将对公司媒体的批判，化为“媒体改革运动”的实施。如果说《富媒体、穷民主》是麦克切斯尼对美国公司媒体系统的一次深刻解剖，那么《传播革命》就是这位传播活动家的一段革命历程。

[1]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著，谢岳译：《富媒体、穷民主》，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中译本序第 10 页。

麦克切斯尼认为，媒体与传播的紧要关头来临的三个标志是：新的传播技术摧毁了现存的制度；媒体尤其是新闻业传播的内容，其可信度逐渐下降或者被视为非法；国家或社会出现了主要的政治危机——严重的社会失衡。一旦上述条件成熟，既存的社会秩序将不再有效，必然导致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发生。20 世纪出现过三个“紧要关头”：第一，1890 至 1920 年的“进步时代”，新闻业陷入危机，整个政治体系出现混乱，这个紧要关头的结果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出现；第二，20 世纪 30 年代，广播的出现与公众对商业主义的反感混杂在一起，成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背景，其结果是放松管制的商业广播模式的形成，它为随后的电子媒介技术如 FM 广播(调频广播)、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提供了发展模式；第三，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早期，美国社会改良运动的频发刺激了作为社会和政治评论一部分的媒体激进评论的出现，其结果是传播内容的模糊化。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紧要关头的出现都是与传播研究的转型相伴而生的。

20 世纪末 21 世纪以来，在很多层面上，传播领域的问题逐渐增加，但是解决之道却乏善可陈，随之而来的新自由主义迅速掩盖了这些问题和矛盾。麦克切斯尼一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促使媒体集中和民主崩溃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保护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提倡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允许媒体最大程度的兼并。麦克切斯尼认为，媒体集中于少数大型公司，而公司惟利是图的性质决定了媒体无法服务于公民。因此，媒体由谁控制以及媒体为谁服务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媒体如何控制、如何构建和资助的问题，应该成为民主辩论的中心话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却销声匿迹”。

新的紧要关头的出现，首要的标志是“新的传播技术摧毁了现存的制度”。麦克切斯尼把互联网作为数字革命的代表提了出来，他认为导致数字传播技术的革命性特质是消除传统媒体之间的割裂，如媒体(广播、电视等)与电信之间，如中介体与人际传播之间。一个典型的范例就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推进了媒体分裂局面的结束，数字革命正在颠覆现存的媒体产业和商业化模式，互联网技术将成为现有媒体制度的“掘墓人”。新闻业已经陷入“进步时代”以来的最低潮，制度性腐败和与日俱增的不平等使政治系统也处于不确定状态，经济体系也陷入混乱，一个新的紧要关头已经迫在眉睫。

麦克切斯尼对于美国乃至全球媒体系统的判断是立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的。美国左派学者爱德华·赫曼(Edward S. Herman)曾经指出,有两个卡尔·马克思:一个是“社会主义活动家和乐观的启蒙主义者”;另一个是“杰出的智者和渊博的资本主义观察者”。^[1]前者我们耳熟能详,作为后者,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是立足于对利润的追求之上的,即所谓“资本积累”。麦克切斯尼认为,这一点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是理解过去几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经济巨大增长的起点,是解读这个利润体系如何运转、如何衰退,以及它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的起点。马克思的思想激发了20世纪70年代后传播研究中三个重要领域的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对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来说,它所独有的两个主要研究范畴是:一,媒体系统是怎样“以一种批评的方式”相互作用并影响社会中所有力量的配置;二,市场结构、广告支持、劳动力关系、利润驱动、技术和政府政策是如何促成媒体企业、新闻实践、娱乐和社会其他行业的本质及其内容的进化演变的。这两个范畴,成为“亲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斗场。根据麦克切斯尼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对商业媒体的浓郁的批判色彩,是它长期以来游离于主流传播研究之外,处于边缘地位的原因所在。

与本·巴格迪坎、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赫曼等左翼学者相同的是,麦克切斯尼也认为美国的公司媒体以追逐利润为其第一法则,在政府的“鼓励”下,媒介公司制作迎合受众需求的各种节目,使公民沉湎于娱乐节目的世界,导致公民既失去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也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进而致使民主政治文化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美国极度萎缩,导致公民的“政治疏离”(Depoliticized)现象,民主也因此变成为“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2] 麦克切斯尼指出,在“没有公民”参与的民主下,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并没有授权成立由公司经营的、以利润为驱动力的、商业运作的媒体系统,然而,如今美国的媒体系统是由政策和政府补贴制造出来的,媒体系统由利润驱动,媒介市场不再是自由的市场系统。媒介政策的制定在这一现状

[1] Edward S. Herman, "The Reopening of Marx's System", *New Politics*, Vol. VI, No. 4 (New Series) (Winter 1998); pp. 131-35.

[2] 谢岳:《没有公民的民主:美国的政治悖论》,见《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

的出现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美国的媒体政策制定过程已经被大型公司所控制，几代公众都没有参与其中。由此可见，要改变媒体传播的现状，就必须从媒介政策的制定这一环节入手。

与诸多学者不同的是，麦克切斯尼并没有停留于理论的呐喊，他把传播研究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行成于思，行胜于言”。从2002年“自由的新闻”成立以来，麦克切斯尼领导这个媒体改革组织取得了两项实实在在的胜利：2003年推迟了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试图制定放松媒介所有权的规定；2006年阻止了国会对《电信法》的全面修订，该修订拟通过区别对待互联网网络供应商来进行网络封锁，旨在取消“网络中立性”。^[1]这些胜利并非是通过一位大学教授的呐喊及其著述而赢得的，而是得力于数以万计的把媒体当作一种政治事务的公民来实现的。2003年至2004年，全美曾召开了大概14场非官方的城市集会及公众听证会，目的在于讨论媒体所有权。数百万美国人参与了这些涉及他们生活、成长的社区媒体的所有权的讨论，公民们表现出希望公共性和非赢利性广播更加壮大的愿望。2006年发生的“网络中立性”斗争，最初有“自由的新闻”与SavetheInternet.com的联合，后来有来自政治领域的800多个组织卷入其中。根据麦克切斯尼的统计，全美还有多个非官方组织是媒体改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它们在媒体事务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与此同时，主流新闻媒体几乎停止了对媒体政策讨论的报道，而互联网恰恰弥补了这一缺失，成为联络和鼓舞人们的渠道。

媒体改革运动成了吸引大众参与政治的合法基础，与之紧密联系的还有财经改革运动、选举权以及选举系统改革。媒体改革运动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吸引人们进行政治活动的手段。有数量如此巨大的公民投身其中的原因，一是媒体改革运动的进步性和非党派性；二是公民们意识到他们身处其中的媒介环境已经祸及生存环境，“娱乐致死”并非危言耸听。媒体改革运动，是一场公民参与的民主运动。

麦克切斯尼认为，自2003年至今的美国媒体改革运动表现为四个部分：一，以“自由的新闻”为典范，很多团体聚焦于媒体政策的制定，它们共同

[1] Carlin Romano, "Big Fish and Small Fry",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8.

关注政府在多种层面上是如何给予媒体以政策和补贴支持的；二，为独立媒体和非传统媒体在数字传播技术应用中的迅速发展，争取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三，加强媒体批评并教导人们了解媒体是如何运作的，在社区中向普通公民开设提高和发展媒体扫盲的课程；四，通过商业联盟或商业协会将独立媒体所有者、有独创性记者和传播从业者组织起来，以捍卫他们在媒体系统中的地位。而这四个部分共同关注的是：社区中的有色人种、妇女、劳工和无家可归者，在这场常常被定义为“媒体正义运动”的改革中，这些人群承担着必不可少的角色。

在我眼中，麦克切斯尼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珂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敢用自己不懈的行动和学术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与堂·吉珂德不同的是，麦克切斯尼不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人，他从媒体系统的困境出发，闻知社会亟待改革的气息，并以严谨扎实的学术成就开出变革媒体和社会的济世良方。我想说的是，现实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一定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因此，在通向理想的大道上，如果不能一米一米地前进，那我们就一厘米一厘米地前进；如果不能一厘米一厘米地前进，那我们就一毫米一毫米地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努力地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喻国明写于2009年2月

中国和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革命》中译本序言

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

2007年秋天，在我任教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我给来此一年的12位中国访问学者举办了一场关于媒体与传播研究现状的讲座。在演讲之前，我们围坐在会议室中，每位访问学者介绍了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

这些学者中有一位是主攻经济学的，我问她研究过哪些美国经济学家，她立即回答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我们都研究米尔顿·弗里德曼。”我很惊讶，问道：“你们真相信他的理论？”她回答：“是的。”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很多美国学者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研究的评价并不高。我问她是否熟悉其他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是他们给予我们对世界迥然不同的认识。她回答说：“不熟悉，我没读过那些人的作品。”我问她，是否中国经济学者不再读卡尔·马克思了。她说：“是的。”她以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的方式承认，就像他们在孩童时代是被父母逼迫去阅读《圣经》似的。

在我给这些学者的演讲中，我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进行了实事求是而又详细具体的批评。他的研究前提是一个怪念头，即人性是不可靠的。他的研究建立于关于自由市场的根本不存在的理念之上。在政府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他的研究结论是虚构的和荒谬的，把他的理论运用于当代中国实践将是不明智的。他的研究与政治的关联度远远超过经济，显而易见，在他的写作和行动中，他坚持政治民主理念并轻视明达的自治。这是他的核心价值观。他的著述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开了绿灯，这些政策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政

治腐败和专制、不合情理的物质至上主义和异化现象，以及环境灾难的激增。

那位女经济学者感到十分震惊，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批评。在她的脑海里，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写作的书，即使不是《圣经》，也是为自由市场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对于她来说，我所说的好像是天书，根本无法理喻。

我也用一些极有意思的例子指出，米尔顿·弗里德曼涉及媒体和传播问题，他总是援引的说教之词是，在政府直接或间接创造和补贴的媒体和传播系统中，自由市场与现实世界中的传播没有什么瓜葛。弗里德曼不了解也不关心广告，而影响着媒体运作和媒体内容的正是广告。弗里德曼对新闻业的了解比他对政治和民主理论的了解更少，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所提出的仅仅是一些陈词滥调，这为那些因为投机而掌握了控制权的媒体所有者和政治家们所喜爱。

当我应邀为我的《传播革命》中译本撰写序言时，这种角色的互换发生在我身上。我很荣幸有几本书被译成中文，而且有很多中国读者了解我的研究。我的研究是批判性的，那意味着我不认为媒体和社会的现状必然是适当的或有益的，而且我相信所有社会机构和关系必须置于一套明确的民主价值的批判视野之中。社会研究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世界将变得更好。有时，这些变化是保护、维持以及延伸既存社会中我们拥有的财富，在此意义上人们称之为保守派。在另外一些时候，有些对既存的现实的变革可以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 and 整个世界，在此意义上看似与精神、文化无关的企业也是激进的。

我的研究属于“传播政治经济”的一个分支。在本书中，我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研究传统。我认为该传统对于中国媒体的未来以及中国本身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们当今乃至未来十年做出的根本性决策，将决定下一世纪中更多时候媒体系统的形态以及中国社会的形态，达此目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中国未来延续的道路也将深刻地影响到其他各国和人类历史的进程。

传播政治经济在美国又常常被称为批判政策研究，事实上，它们是一回事。在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沉浮”，这里的“沉浮”是与研究中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环境相关联的，而不是与这个领域本身的

关联。事实上，这个领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壮大且富有影响，它正在美国和全世界崛起。这一研究传统指出了为什么媒体是如此运作的，媒体提供了何种新闻和信息等核心问题。这一研究传统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制造政策改变以改善相关环境的分析。这一研究传统使用了从量化研究到历史研究的多元化的方法论。

传播政治经济，我也是这一批判传统的一部分，对于中国学者和公民来说，它是一种有力的和高于一切的信息：在中国，与在其他国家一样，现存的媒体和传播系统不是自然天成的或者无可改变的。它已经形成并且努力去合乎特殊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它在鞭挞某人某事的同时提升着某些价值。学者们需要明白在中国创建这一系统的力量，解释这一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学者们需要为中国人民和他们在政府的代表们提供一种必要的认识，即维护和/或改革媒体和传播系统以最好地服务于中国人民的需要。这是一个课题，要求广泛的和知情的公众参与。学者们在创造这种可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008年6月

致谢

本书的写作源于2006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的两次讲话。第二次讲话是当年十月我参加“回到未来：传播和历史的探索”会议的论文的一部分，题目为《新政治经济与新闻史的反思》。我要感谢那个会议的参加者，特别是保罗·斯达尔、迈克尔·舒德森、詹姆斯·卡瑞安、卡罗琳·马文、约翰·德汉姆·彼得和大卫·诺德，感谢他们对论文中一些论题的评论。我也要感谢迈克尔·德里·加宾尼和巴比·泽利泽邀请我去宾夕法尼亚，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的教研人员与研究生们对我讲话的广泛回应。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当然我将为书中所有的文字负责。以下几段提到的这些人，均为才华横溢者，我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在写作此书的那段日子里，与其说我是书的作者，倒不如说我是一本书的“制作者”。

关于书稿的一些特殊段落，我从他们中间获益：约翰·安德森、迈克尔·舒德森、马克·库珀、拉里·葛罗斯伯格、吉姆·施耐德、爱德华·S·赫曼、佩德罗·卡班、彼德·迪克拉、本·斯格特、托比·米勒、苏珊·道格拉斯、马文·阿莫瑞、克里斯汀·桑德维基、艾德·贝克、詹妮·汤米、圣迪阿塔·查-朱阿、罗恩·叶茨、史蒂文·海勒、吉姆·鲍曼、艾伦·拉夫、大卫·费利克斯、帕特里克·巴雷特、蒂姆·吴、保罗·布勒、德里克·塞德曼、理查德·杜波夫、艾米特·M·斯凯耶特、吉姆·哈珀、迈克尔·格伦夫、兰迪·巴克尔、罗宾·哈赫内尔、克雷格·艾伦、苏特·杰哈利、吉纳瓦·奥瓦霍塞、詹姆斯·L·加图索、索妮亚·利文斯通、本·曼斯基、理查德·约翰、斯坦利·阿诺维兹、斯格特·罗瓦斯。

德瑞克·特纳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人员为我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安德烈·雷提供了影印帮助。卡米拉·科瓦奇和维克多·皮卡德是我最好的研究助手。他们对于我的每一个要求，都毫无例外地即时给予满足，对我照顾有加，远远超过我的预期。我简直被宠坏了。

罗瑟琳·莫拉莱斯·克恩斯对全部手稿进行了专业的编辑。克雷格·艾伦也克服困难对编辑后的手稿进行了再订正和编辑。除了履行“自由的新闻”传播主任的职责，克雷格利用周末时间无偿地完成了这些工作。罗瑟琳和克雷格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帮助我完成写作，我要感谢他们二人。

还有一些曾与我合作授课和共同从事研究工作的享有声誉的同僚们：兰斯·班尼特、丹·席勒、德瑞克·特纳、维沃克·蔡伯、约翰·伯利曼·福斯特、英格·斯透、拉里·葛罗斯、安德烈·希夫林、迈克尔·德里·加宾尼、维克多·皮卡德、本·斯格特、约翰·尼禄、苏珊·道格拉斯、布鲁斯·维廉姆斯（2006年他离开伊利诺伊大学赴弗吉尼亚大学任职，但他仍旧是我的同行）、埃里克·克兰纳伯格、乔希·西尔弗和约翰·尼克斯，他们都对我的手稿进行了仔细阅读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们中所有的人都曾放下手中的工作，挤出时间，勉励支持我的写作。班尼特、德里·加宾尼和葛罗斯的鼓励贯穿我写作的整个过程，使手稿受到的批评能够得到妥善而恰当的处理。我的四个同事：席勒、尼禄、斯透、维廉姆斯以及两个优秀的博士生——皮卡德和斯格特，都付出了宝贵时间和精力来品评手稿，并帮助我确立基本的论点。

2007年1月，当我将粗糙的提纲呈送给上述17位读者时，一想到“质量”，我几乎要退缩了。这本书没有让读者们退缩，他们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是我真正的朋友，我感谢他们。

最近几年里，我从内心认识到，将一部手稿付诸出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杰夫·库恩对手稿的编辑超过了我对它反复的思考和推敲。杰夫具有非同寻常的综合能力，他的媒体知识如此渊博，超过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他有着敏锐异常的政治直觉，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作者和编辑。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的大作《有线新闻的秘密：我在公司媒体的历险》（波力点出版社，2006年版）激发了本书的思考。杰夫从他繁忙的工作日程中抽出时间来，推动此书的出版。

从我提及写作此书的第一时间起，“新出版”公司的安迪·肖就鼓励和支持我的创作。他并不打搅我，而是偶尔催促尼克斯，我很喜欢他的做法。安德烈·希夫林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他最早阅读和评价我的手稿。我很幸运遇到这样的出版人，很幸运我们拥有这样的出版社。写这本书侵占了我与约翰·伯利曼·杜克·福斯特合作的一本关于全球传播和资本主义垄断的著作的写作时间（也是由“新出版公司”出版），因此，我要感谢杜克的支持。他完全有权利不这样做。

关于本书的很多思考，就像与杜克·福斯特一道，我还得到了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英格·斯透、维沃克·蔡伯和约翰·尼克斯的启发。我记得，我遇到他们四个的确切时间是在 34 到 13 年前，几乎从第一次起，他们就成为我生命和灵魂的伴随者，并持续至今。他们四个的洞察力、品行以及其他行为，影响着这本书的每一页。他们与我共同前进，他们也经常充任我的导师。

在过去四年中，我致力于筹建媒体改革组织——“自由的新闻”（www.freepress.net），期间的经验是本书的核心组成部分。我非常感激这个特别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感谢他们愿意认真接受这个任性的大学教授。我特别想要感谢总经理金伯利·朗基、执行主任乔希·斯里弗，2002 年，他俩、约翰·尼克斯与我共同创立了“自由的新闻”。金伯利和乔希教我如何使一个大型的复杂的组织按照政治运动方式而不是官僚机构方式高效地运作。我要多说几句乔希，在过去四年中，他给予我关于政治组织的很多教导超过了我的家庭曾经给予我的，他成为我这一时期最亲密的朋友。如果“自由的新闻”的历史可以重写，那么让乔希·斯里弗给予的背后支持更加明晰吧，没有他就没有“自由的新闻”。

还要感谢英格、艾米、露西、齐佩，以及从厄罗德到记忆中的瑞德和 DJ·刚，我不会忘记他们。

伊利诺伊州厄巴纳

2007 年 5 月

目录

中国和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革命》中译本序言 /1

致谢 /1

导言 /1

第一章 传播的危机，社会的危机 /7

第二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沉浮 /37

第三章 历史的转折、紧要关头和“五个事实” /94

第四章 关键时刻 /143

索引 /201

译后记 /233